

Sannong

Zhongguo

总第4辑

2004 · 3

SANNONG ZHONGGUO

三农中国

曹锦清

中国农村转型：转向何方

陈锡文

中国农村需要解决五大问题

温铁军

三农问题之不同于农业问题

何开荫

关于将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的建议

张鸣

漫议乡间合作发生的文化条件

姚洋

以市场替代农民的公共合作

老田

「选举」与「自治」能够帮助农民解决什么问题

胡振栋

覃世清

「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传奇人生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三农中国 2004 · 3

总第4辑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编

主 编：贺雪峰

执行主编：董磊明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农中国 2004·3/贺雪峰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12

ISBN 7-216-04186-0

I. 三…

II. 贺…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F32-53 ②D422.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033 号

策 划 窦鸿潭

责任编辑 窦鸿潭

王 薇

三农中国 2004·3

贺雪峰 主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安陆市鼎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44 千字

定价:10.00 元

版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16-04186-0/F·75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三农中国》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建嵘	卞利	毛丹	王铭铭
仝志辉	白南生	孙立平	孙秋云
朱苏力	吴毅	吴重庆	张鸣
张静	张乐天	张佩国	张晓山
李昌平	陆学艺	周晓虹	金太军
姚洋	柏贵喜	洪大用	贺雪峰
赵树凯	钟涨宝	项继权	党国英
徐勇	秦晖	郭正林	曹锦清
温铁军	程漱兰	董建辉	董磊明
韩俊	樊平		

目 录

专家论坛

- 曹锦清 中国农村转型:转向何方 /1
陈锡文 中国农村需要解决五大问题 /15
温铁军 三农问题之不同于农业问题 /25

热门话题

- 何开荫 关于将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的
建议 /35
陈文胜 三农问题有多少是乡镇造成的 /43
欧阳中球 农业税取消以后,乡镇是否有必要保留 /52
董磊明 新的发展观、发展战略与乡镇职能的强化 /62

三农评论

- 高 昱 回乡随感 /78
孙 亮 关于以德论农的思考 /82
刘 岳 县乡干部对政策的理解 /88
田永胜 从关注农民增收转到提高农民福利 /97

专题研讨

- 张 鸣 漫议乡间合作发生的文化条件 /100
姚 洋 以市场替代农民的公共合作 /106

一家之言

- 老 田 “选举”与“自治”能够帮助农民解决什么
问题 /111
陈志武 农业发展的极限 /123
杨 帆 西方经济学不是神学 /132
余 蕊 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状况及未来趋势
预测 /136

学术评论:

- 刘卫兵 灰村正在进行民主,结果我们应该警惕
——读朱凌《灰村纪事》 /146
- 谭同学 草根民主与村庄政治竞争
——乡村治理视野中的《灰村纪事》 /150
- 曹国英 《灰村纪事》带给我们的思考 /156

乡土随笔

- 龙 波 从维权上访到乡村建设 /163
- 申端锋 饭桌上的规矩
——荆门农村调查随感 /169

三农人物

- 胡振栋 章世清 “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
传奇人生 /173

简讯

- 王 森 乡镇体制改革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182
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在武汉举办 /51

编辑后记 /184

专家论坛

中国农村转型： 转向何方

曹锦清

从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开始,我即着手对农村社会的研究,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并不是说16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农村问题,但可以说这16年中我一直在关注三农研究的进展。从1995年、1996年开始,尤其是1997年以后,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严重,三农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这门显学是建立在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基础上的,一旦成为显学,就能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加上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也引起中央高层整个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转移,也就是新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出台,并且对农村的经济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倾斜。

因为三农问题成为显学,所以参与三农问题讨论的人就大量增多,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使人应接不暇,更重要的是引发了过去那些从来不研究三农问题的人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堆积了大量天才的猜测,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根据的观点。要论证那些天才的猜测或驳斥那些没有根据的观点,以清理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给出一些可行的答案,我感到十分的困难和困惑。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使得像我这样的人,在价值、立场方面重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困惑:既看到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又看到这个趋势内部蕴含的严重对抗,使我们(就我本人而言)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时发生了一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使我在近几年来就三农问题几乎没有发表过文章。只有在少数的场合,就像在这里,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允许我“胡说八道”,就随便说说。在其他场合,因为怕说错,就很少发表这方面的言论。

上面算是个开场白,也算是交代自己发言的心境。这个心境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下面的发言可能会充满着内部的矛盾,如果这些内部矛盾存在,就是我的这种心境的反映。

我觉得三农问题研究进展到目前这一阶段,的确应该就一些重大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说,应该把三农问题列入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中加以思考。今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仅供参考。

二

第一大问题,将三农问题置入何种社会发展框架中来进行研究。

我们通常说,研究三农问题是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在转型以前,传统中国社会里当然也可以说有所谓的三农问题,如土地兼并,税赋沉重,农民反抗,人口增长,土地分配,大量流民出现等等,还有一些自然灾害等也可以视作三农问题。那些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发达国家当然也可能存在某种三农问题,比如要对农副产品进行补

贴,要抗击第三世界廉价的农副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等等。但是,这两种三农问题和转型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三农问题。但是,有一个概念,我们经常使用,但确实是充满歧义的概念,这就是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流意见,一种是非主流意见。主流意见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激进的,一类是比较冷静的、或温和的。这些区分我下面会谈到。关于非主流的社会转型的框架,也有两类。

先介绍非主流的框架。因为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通常的解释框架是: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或者说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在我们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和报刊杂志上都经常是这样提的。另外,关于社会转型,还有若干种比较次要的,但也是经常出现的提法,如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学者在讨论这个转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错误提法:如有人干脆就把它看成是由原有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还有就是从政治上来讲的,就是从人治到法治,到逐渐的民主;还有从社会学来讲的,从群体到个体,从身份到契约;还有一种就是从农民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等等,但是核心的就是从农耕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轨。这个工商社会,在我们的理解当中通常是以发达国家为摹本的。其实,近 100 年来,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框架,随着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其根据主要是资源有限论,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论,尤其是石油资源的有限论。就是说一个 13 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要发展,要崛起,要达到一种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的人均消费状态,有没有可能?

属于非主流的一派观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自身的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国际交换得到的资源)不可能使

得中国的大部分人进入中产阶级,模仿西方那种消费,那么他们认为中国的转型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理想的可能性。因为这两种判断将对我们三农问题研究带来重大的影响。

第一种判断(现实的可能性)认为:既然中国不能实现大部分人进入中产阶级、模仿西方的那种消费方式,那么中国将进入一部分人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而绝大部分人不可能。这样中国将走向一条地区不均衡的发展道路,就是广大的农村资源,输入到城市,注入到沿海,这里包括土地上的产出,通过价格机制向城市转移财富,这个在1997年以后我们就看得很明显:农副产品的价格逐年下跌。据有关部门的估计,1997年、1998年,直到2001年,大概每年有1000亿元通过价格机制向城市转移。当然,反过来,去年农副产品价格开始上升,就是城市的财富通过价格机制开始向农村转移,也是使得农村情况有所好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政策调整是一个次要因素。这个财富的转移,除了前面所讲的地面产出,还包括农民劳动力本身:人才和劳动力,也向城市输入,农村的整个教育不完全是为农村提供人才,农村的劳动力——农村家庭现在已经深刻地卷入了货币经济,他必须为买进而卖出,当自己的地面产出和家庭储蓄不足以通过卖出来获得从市场所要获得的必需的时候,他们必须以自己的劳动力获得收入。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面,劳动工资10多年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劳动时间的延长,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这也是通过不完全补偿农民的劳动力的方式来向城市转移财富。

另外,他们还提出,农民的土地直接成为了权力和资本的侵蚀对象,据说地方财政相当一部分的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土地。据我所知,从1992年以后,上海10年(1992年~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3600亿元,其中约有1000亿元来源于土地。到

底有多少土地由于非农的使用而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是怎样在地方政府、开发商、中介商和村及农民间进行分配,可能是一个永久的谜——谁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一部分人的富裕是建筑在财富不规范转移的基础上来完成资本积累的,所以解释了为什么短短的1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而且达到如此高的消费水准。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在这种观点下面来审视三农问题,那么它研究的题目就被确定下来了。这就是农民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这也成为三农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样三农问题就可能是一个政治学上的问题。

如果说让资本和权力自由结合的发展模式将会导致中国安定团结局面出现问题的话,他们建议第二种发展模式(理想的可能性),这种发展模式可能是更加强调理想和价值的,就是整个的改革开放,整个的发展要建立在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之上。这个可持续就是要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相对地吻合,也就是说这个发展要使多个社会阶层从发展中分享到自己的好处。这个分享并不是说绝对的平等分配,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一个阶层可能多一点,另一个阶层可能少一点,但决不能走上一个阶层之多恰是另一个阶层之少的路子。就是说不能走上零和博弈。

由于资源的约束,整个发展建立在两个基石之上,一个基石就是发展的成果要为多个社会阶层所分享,而不能为一个或两个社会阶层所独享,而使更广大的阶级或阶层付出代价;第二个基石就是要小富即安,因为在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石油资源——硬约束条件下面,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去消费土地、消费土地上的资源,消费能源和其他多种资源,永远达不到像西方国家的那种消费水平。即中国只能够做到小富即安,也就是小富有而均,较为均衡的这样一种社会。如果要达到这样,那么

高度地刺激消费,以消费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就被宣布是无效和有害的。如果要移植这种发展模式,要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等于是中国人自身要建立一种活法,不同于西方人的那种活法,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全民的价值共识,而首先要在专职思维的那一群人就是知识分子中建立起价值共识,没有知识分子的价值共识,没有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价值共识,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如果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按照这种方案来研究三农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城市平衡论——如何保持城乡相对平衡发展的三农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视角,而不能把农村仅仅看成是一个资源的提取之地,而将来要抛弃之地。就是说 13 亿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久地在农村生存,要建立起一个合乎于农民生活的那种环境,这样的三农研究的价值取向就被确定了。

这是我讲的非主流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以及两种不同三农问题的审视角度和解决方案。

再回到主流的框架。主流框架前面讲到主要是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而工商社会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在这个转轨的过程,对它的时间长度、复杂程度、困难程度的估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大概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转型就可以完成,中国至少可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可以达到所谓的全面小康。如果在这么一种框架下面,就是说三农问题出在农村,但是解决的出路在城市、在沿海,所以三农问题的着力点是研究在农村,但解题在城市、在沿海。有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长江边上的中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框架。就说你们中部就维持一点:稳定。大量的人口向东部输送,主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输送,所以他们既对三峡工程有看法,也对南水北调有看法,他们说与其将水接到北方去让他们喝,还不如让北方

和西部的人跑到长江边来喝水。所以，根据中国土地稀缺的现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造密集型的大城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这个思路给研究三农提供另外一种框架和思路。按照这种思路，他们要求土地尽快地私有化——即成为一种完全的经济要素，在产权明晰、自由交换的名义下。他们认为产权明晰一方面可以摆脱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由于产权模糊而产生的剥夺农民的圈地运动。由它推论的结果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农民土地可以买卖，把土地买卖的钱可以完成城市化，就是说他拿这笔钱可以到城市买房子去，至于买了房子干什么，他们不知道，甚至有人提出来，把那么多的农民集中起来搞小城镇，搞中等城市，搞起来以后，需求就会产生供给。需求会直接产生供给，我不懂经济学，如果这样就可以解决第三世界的三农问题，那么我觉得是太简单了。所以 they 要加快城市化，批评由于户籍制度而使城市化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他们要求改革户籍制，主张土地私有制，然后让千百万的农民——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急剧地迁徙。这样解决三农问题的话，或者研究三农问题的话，那就不在农村了，那就在城市里研究，也就成了一个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问题。

另一种意见也承认这个框架，但是它根据中国是后发国家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对土地的严重约束的基本事实，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工业要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然后其他必要劳动力也吸纳过来，以此加快农村的发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样一个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过程。所以对它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由此确定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心。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遇到经济的周期，大量被城市和工业吸收的就业人口，还有大量返

回农村的可能。这个转轨如果是必然的话,但是漫长,而且在漫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曲折,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逆转。我们如果从这个方面去研究三农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去研究当代中国土地承包制的稳定和改进行,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质,必须重新理解改革开放的原始起头——它是以差异性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而这样一种改革的前提恰恰是绝对主义的土地均分。为什么?土地均分是不经济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是低效率的,但它是公平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农民惟一能接受的一种制度,所以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是什么性质?承包制下的小农和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千万雷同的规模极其有限的小农,温铁军讲据他的估计有 2.3 亿个小农户(户籍制意义下的)。这些小农,他和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里,东部、中部、西部出现了重大的差异。当然不是所有的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的东部地区,尤其集中在苏中、苏南、浙江、福建一部分,广东大部,像这样一些沿海地带,当然包括中西部城郊的这一带,那里的农民(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完结了,即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了,地方财政的中心也已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了。但是对中部的广大地区,不可能像东部一样,普遍地发展企业。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我们预计的用地方性的工业,包括每县、每乡镇、每村这样来发展工业,来就地消化劳动力,这样一种情况到 1992 年我们就看出来根本不行了,整个工业布局向东部集中,甚至连梯度转移的那种硬性发展也不可能了。如果东部、中部、西部是三个独立的国家,它有明确的边界,那么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务成本、商务成本提高了,有些工业可能向中部转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所以资本不愿意承担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这个成本要劳动力本身来承担,所以企业还是大量集中

在东部。农民是跨省区流动就业,这种格局将长期维持。所以我讲,农民和中部地区的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同样的一个政府的架构、政府的层次、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全国规模的这样一种职能雷同的机构,对中部来说是发展的动力还是阻碍?是稳定的基础还是可能产生不稳定的一种原因?值得充分研究。另外,单家独户的小农和大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年我们看得太多太多了。因为农民确实像小企业主一样,对农副产品的价格信号会作出或迟或早的反应。因为你能够作出反应,你能改变种植结构,其他的农民也能够改变,因为他们规模同样狭小,你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我也能进入,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哄而上。一盘散沙的农民,不组织起来的农民,怎么能够应付大市场?这也是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另外,如果劳动力无限增长是绝对的,农民工不可能分享GDP增长的任何好处,那么在当前农民工的工资结构中,他不可能有进城以及自我保障的那两部分费用,不可能在工资里面记录。就是说工资就是给他吃饭的,然后积点钱,只能回来盖房子、娶老婆,别的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就没有别的钱了。这就是说城市地价的提高以及房价的提高,天然地阻止了农民工成为城里人,农民工只能在城里打工而不能在城里落户。这种情况不仅针对农民工而言,针对我们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研究生也起到了这个作用,研究生毕业一个月1200元,夫妻两个2400元,不可能城市化的。因为城市化首先要存一个购房的钱,还有一个自我保障的费用,他一下子不可能列入城市保障的,如医疗费等还得自己掏。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力比较强的,从事经商等的那些农民工精英,才有可能完成城市化。如果这个判断大体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将长久地存在。在半个世纪内,我看不到它消失的可能性。这样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了。诸如此类,我不加细说。我这里证明的一个观点是:

三农问题的研究视角。总视角、总思路随着你对社会转型的不同判断而发生差异。所以对社会转型的判断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这里我把主流的意见分成两种,一种激进的,一种温和的。当然我主张、我偏向于主张温和的一种。非主流当中的某些观点采取吸收的态度,对他们总的结论我可能并不加赞同。这还是多年来社会调查的一种积习,因为我强调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对应该是什么这样的判断,我这些年是越来越淡漠了。当然,他们提出“应该”,也可能会为我们进行社会批判提供一条价值尺度。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忧虑的是如果中国最终要完成向工业化的转轨,因为这是我们百年的梦想,但是这个过程一直被我们由于急躁而缩短了:大跃进的思想从康有为开始,他说给我中华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孙中山说大概十来年,毛泽东说15年,超英赶美不就15年嘛!后来时间就延长了,邓小平1980年左右就讲要分三步走,大概是2030~2050年左右完成这个过程。我看时间还要拉长,我们这代人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波折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还要加一句,前途是光明的。

三

第二大问题我就讲得简约一些。第二个研究三农问题的宏观问题与方法论有关:就是要对三农问题进行宏观的把握。我们必须建议中央进行一次关于三农问题的全国性普查,这个任务迫在眉睫!现在我们经济普查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大概今年要展开。人口普查的指标太少,信息量远远不足。就关于三农问题的普查,这个普查可以得出全国性的宏观数据以及各地区差异的宏

观比较。没有这些数据,没有这些宏观结论,要指导我们微观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极其困难。我越来越感到,这些年我们微观调查没有少搞过,但从这些微观调查中要试图引出关于三农问题的全国性判断是不可能的。当然有些人写书的时候,理论的架构是全国性的,他的实证材料是一个个案,在一个宏观的理论架框当中装着若干个个案的调查,我认为这两者的结合,叫包办婚姻,这是一种非法结合。由于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紧迫性,使这种作法日益加剧。如果有一堆材料,而没有理论,搞实证调查的最怕那些导师说他没理论,然后就搞那个理论框架,里面装点材料,有的就搞点个案调查,说“关于中国的什么问题”就这样出来了,这是不合法的!因为这中间没有一个逻辑的过渡。关于三农问题的宏观判断,不可能通过各个微观的叠加而所谓地概括出来的,不可能的,这是我十年的惨痛教训。十年我除了东北没有走过,我全走过了。包括台湾我也走过,我也调查三农问题去,当然香港没有什么三农啊!西藏、新疆我都跑过了,这样走了十几年吧!我原来是搞哲学的,这些哲学家们,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常和他们争论,我说你搞黑格尔什么的,然后搞出个什么结论来,一演绎就要改变中国。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我说社会学,马克思为什么先研究哲学、法学,而后转到政治经济学里面去,他说要研究当代必须从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是走马克思道路,从青年马克思跳到中青年马克思。我们要理解中国,必须要深入实践,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研究中国这部书的不二法门,所以我赞成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们说你这是彻底的经验主义。

经过那么多年走过来,随着经验材料的积累,区域差异的无限之大弄得我头晕脑涨,以至于全国性的三农问题的判断,我是张口结舌,免谈。别人谈的我知道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不对在哪里?所以我驳斥胡说八道是有余的,但是要拿出一个判断来,我